

第一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社交焦慮者的記憶偏誤研究

一、認知模式與記憶偏誤

焦慮疾患的認知模式中，許多研究者關注認知歷程中的記憶偏誤，依據訊息處理模式的理論預測，焦慮性疾患對於威脅訊息(threat-relevant information)應有記憶上的偏誤(Beck, Emery, & Greenberg, 1985; Bower, 1987)，此記憶偏誤指涉整個記憶歷程中對於威脅訊息的偏好或優先處理，理論上，在編碼、提取等階段都能觀察到此偏誤，但亦有學者持不同觀點，Williams 等人回顧當時對於焦慮疾患的記憶偏誤研究，認為記憶偏誤並不一定出現在整個記憶歷程，他們提出整合的解釋模型如下：焦慮個體在訊息處理前期，即自動化(automatic)歷程，傾向將注意力導向威脅刺激，而在訊息處理後期，即控制化(strategic)歷程，將注意力自威脅刺激遠離，因而降低在提取階段的偏誤(Williams, Watts, MacLeod, & Mathews, 1988)。

在社交焦慮者的病理文獻中，相對於注意力偏誤的研究，社交焦慮者的記憶研究結果鮮少一致(Ledley & Heimberg, 2006)。依記憶作業的特性，社交焦慮者的記憶偏誤研究又分為兩大取向：顯性(explicit)與隱性(implicit)記憶，或又分別稱為控制化與自動化處理歷程。依據 Coles 與 Heimberg 的定義，顯性記憶代表刻意或努力提取先前已習得訊息，通常以自由回憶(free-recall)或再認(recognition)作業來測量，相反的，隱性記憶則是對已習得訊息的非刻意提取，通常以間接(indirectly)方式測量(Coles & Heimberg, 2002)。顯性與隱性兩大記憶研究取向可用以檢驗 Williams 等人的觀點，若他們的觀點正確，可預期社交焦慮者的記憶偏誤將出現於隱性作業的結果，而非顯性作業。以下將回顧相關研究結果。

二、社交焦慮者的顯性記憶偏誤研究

在社交焦慮者的記憶研究中，最為傳統與直觀的測量方式為自由回憶作業與再認作業 (Rapee, McCallum, Melville, Ravenscroft, & Rodney, 1994)，這類測量顯性記憶的作業典範通常以語義類 (semantic) 的字詞為刺激材料，先給與受試者不同類別的刺激字 (威脅字、中性字、正向字)，要求受試者儘可能的記憶，或對刺激字做某種認知處理 (例如自我相關評估、想像畫面等)，隨後以自由回憶作業以及再認作業來測量記憶結果，若高焦慮者對威脅字的回憶量較高 (相較於低焦慮者，或相較於中性字及正向字)，則視為焦慮者記憶偏誤之證據，然而，許多採用自由回憶與再認作業的研究都找不到支持顯性記憶偏誤的證據 (Rapee et al., 1994; Cloitre, Cancienne, Heimberg, Holt, & Liebowitz, 1995; Lundh & Öst, 1997; Becker, Roth, Andrich, & Margraf, 1999)，這些研究結果支持 Williams 等人理論對焦慮個體在顯性記憶表現的預測。

許多研究者試圖提出不同解釋觀點，他們認為實驗的刺激材料可能扮演關鍵角色，因而嘗試使用不同的刺激材料來研究顯性記憶偏誤。Rapee 等人 (1994) 模擬更為真實 (realistic) 的刺激情境，實驗者以口語方式對受試者呈現各類回饋刺激 (例如『你的聲音很清晰』、『你的內容組織很鬆散』)，隨後請受試者自由回憶，結果並不支持顯性記憶偏誤；另一個研究中使用相似刺激材料的再認作業也得到類似結果 (Amir, Foa, & Coles, 2000)。Wenzel 與 Holt (2002) 認為相較於以單一字詞作為刺激材料，整段文章 (prose passages) 能提供詳細的情境脈絡訊息，更能啟動個體的恐懼結構 (fear structures)，進而引發記憶偏誤，然而自由回憶的結果未發現記憶偏誤，作者認為這是焦慮個體逃避對威脅刺激材料做精緻性處理 (elaborate processing) 的緣故。Lundh 與 Öst (1996) 從現象推演，認為「社交畏懼者基本的害怕來自於被他人負面評價，而臉部表情正

是表達正向及負向評價的重要方式」，因而採用臉孔圖片作為刺激材料，他們又提到「臉孔記憶受到個體編碼活動（encoding activities）的影響……對臉孔做人格特質評估使得對臉孔的掃瞄大量增加，因而增進了臉孔記憶」，因而在刺激呈現階段受試者被要求評估每一個臉孔是批評的（critical）或是接納的（accepting），隨後的再認作業結果顯示，社交畏懼者辨識出更多的批評臉孔（相較於接受臉孔）；然而在同樣使用臉孔刺激的另一個研究中，社交畏懼者對威脅臉孔的再認作業並未出現記憶偏誤（Pérez-López & Woody, 2001）。

亦有學者對上述研究典範提出質疑，認為記憶的內容應該來自個體日常生活事件，而非刻意給予記憶素材，如同 Rapee 等人所言，「仍不清楚對於日常生活的記憶是否為選擇性的編碼與提取」（Rapee et al., 1994）。Wenzel 等人則認為對於某些焦慮疾患而言，顯性記憶與隱性記憶的研究典範其敏感度可能不足以偵測個體對威脅的記憶偏誤（Wenzel, Werner, Cochran, & Holt, 2004）。為了解決這些方法學上的問題，部份研究者嘗試改用自傳式記憶作業（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ask），這類典範通常要求受試者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提取回憶，理論上，以受試者本身日常生活的記憶為實驗素材，較能貼近個體在日常生活中真實的認知歷程，然而卻仍未有支持記憶偏誤之證據（Rapee et al., 1994; Wenzel, Jackson, & Holt, 2002）。

綜合上述，近年來在社交焦慮者的顯性記憶偏誤研究中，僅有一個以臉孔圖片為刺激的再認作業結果支持記憶偏誤，其他以語義素材作為刺激的研究典範皆缺乏直接支持證據。

三、社交焦慮者的隱性記憶偏誤研究

早期隱性記憶偏誤的研究中，最常使用的作業為字幹填充（word stem

completion)，作業流程為受試者先練習不同類別的字詞，而後依據提供的字幹填入以此字幹開頭的字詞，觀察先前練習的字詞類別是否影響填充結果，在此脈絡下，隱性記憶偏誤可定義為高焦慮者填充出較多先前練習過的威脅字（相較於中性字及正向字，或相較於低焦慮者），然而在社交畏懼者的隱性記憶研究中，採用字幹填充作業的結果沒有得到記憶偏誤的支持證據（Rapee et al., 1994；Lundh & Öst, 1997）。部份學者批評字幹填充作業所測量的與其說是概念性（conceptual）隱性記憶，不如說是知覺性（perceptual）隱性記憶（Roediger, 1990），換言之，其作業結果受到刺激材料的知覺特性（例如呈現位置）影響，大於刺激材料的語義特性影響。為了克服研究方法學上的問題，Amir 等人採用了噪音判斷（noise judgment）作業，他們以社交威脅句（例如『同事邀請你參加晚餐宴會』）與中性句（例如『手冊教你如何搭帳篷』）為刺激材料，受試者先練習過部份刺激句，在正式測業階段，刺激句伴隨著背景噪音一起呈現，受試者以五點量表來評估其背景噪音的音量，在此作業中，隱性記憶偏誤被定義為受試者對已練習過的刺激句之背景噪音評估得較為小聲，而研究者預期廣泛性社交畏懼組將特別對已練習過的社交威脅句產生記憶偏誤（相對於控制組以及已練習過的中性句），結果支持研究之假設，而隨後使用同樣刺激材料的再認作業中，廣泛性社焦畏懼組並未出現顯性記憶偏誤；Amir 等人對此現象的觀點與 Williams 等人類似，他們認為高社交焦慮者對威脅訊息的記憶偏誤在於自動化歷程，且隨後在控制化歷程抑制（inhibit）了自動化的記憶偏誤（Amir et al., 2000）。Amir、Bower、Briks 與 Freshman（2003）以相似實驗邏輯進一步改良噪音判斷作業，嘗試以視覺刺激材料檢驗隱性記憶偏誤，他們使用影像清晰度判斷（video clarity judgement）作業，亦得到同樣結果，顯示高社交焦慮者對於負向影像有隱性記憶偏誤，而非顯性記憶偏誤。

綜合上述，在隱性記憶偏誤的研究中，雖然曾面臨方法學上的批評，但隨著作業的改良，逐漸出現較為一致的結果，雖然根據現有的證據還不足以對社交焦慮者的記憶偏誤下定論，但大致而言，支持隱性記憶偏誤的證據較支持顯性記憶偏誤的證據為多，這些結果似乎符合 Williams 等人以及 Amir 等人的觀點，亦即社交焦慮者透過控制化歷程，抑制了隱性記憶偏誤，使得過多的負向刺激無法被提取，而在最後顯性記憶作業的表現結果無異於控制組。我們可以推論，若抑制為社交焦慮者所慣用的機制，當實驗情境要求其抑制負向素材的回憶時，社交焦慮者將能確實依照指示，使得負向刺激的回憶量顯著減少。

四、過去研究限制

關於社交焦慮者的記憶偏誤研究的不一致結果，可能是因為研究者們研究不同的記憶歷程，或使用不同的記憶作業 (Amir et al., 2003)。換言之，從不同的記憶功能面向，或不同的作業典範來討論社交焦慮者的記憶特性有其必要性。綜觀記憶偏誤研究文獻，對於記憶偏誤之定義主要為「對負向刺激材料的記憶或辨識數量較多」，此定義可能限制了研究者對結果的詮釋，例如 Wenzel 與 Holt (2002) 發現社交恐懼者對於負向文章的回憶量顯著少於控制組，依傳統記憶偏誤之定義，該結果並不支持記憶偏誤，然而若依記憶功能而言，該結果可能是記憶特性不同面相的展現；另一方面，記憶偏誤是否僅限於負向刺激材料，亦是另一個有待討論的議題，Kashdan (2002) 認為，學者對高社交焦慮者的病理研究過於強調負向情感的面向，而忽略另一個重要面向，是對正向情感的缺乏 (hedonic deficits)，因而如何透過記憶偏誤的研究，嘗試回答正向情感缺乏的相關病理，亦是有價值之研究方向。

另一項限制，過去研究不論顯性或隱性記憶作業，探討高社交焦慮個體對於負向刺激的記憶偏誤時，多從「記住」的觀點出發，然而，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是社交焦慮者的遺忘認知歷程，下節將從另一種記憶觀點－「遺忘」，以及其作業典範「指示遺忘作業（directed-forgetting task）」，作進一步探討。

第二節、遺忘與指示遺忘作業

一、遺忘與心理健康

遺忘是人類皆有的一種記憶現象，若將生活中的重要資訊遺忘，可能會帶來許多不便，甚至是危險，而因遺忘而造成生活功能的下降，最極端的例子為失智症（dementia）患者，至病程後期，大多需仰賴他人的全時照護，以此觀點，遺忘對於個體的心理健康無疑是不利的影響。從另一個角度切入，遺忘對於心理健康卻可能是有利的，對於某些特定事件諸如創傷或負面回憶，若持續沉浸其中而無法忘懷，對於個體適應可能有不良的影響，如同 Bjork 等人所言：「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最大的記憶問題是忘記那些我們想要記住的，然而，遺忘的確是我們需要運作良好的功能，例如，避開那些無用的情緒或失功能的人際關係，或我們想要忘卻過去生命中痛苦或難堪之事。遺忘的另一個功能是使我們與變動的世界保持銜接：我們需要記得現在的電話號碼，而非好幾年前的；我們需要知道現在的電腦系統是如何運作的，而不是過時的老舊機器」（Bjork, Bjork, & Anderson, 1998）。

Joormann、Hertel、Brozovich 與 Gotlib（2005）提到，憂鬱症患者的常見困擾是時常出現非刻意（unintentional）以及不可控制的負向想法與記憶，這些負向認知不僅是加重了憂鬱症狀，並且與憂鬱症的維持（maintenance）及復發相關。類似的情況同樣見於焦慮疾患，Magee 與 Zinbarg（2007）的研究顯示，高社交焦慮者比控制組有更多不想要的想法，且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試著去壓抑這些想法。因此，對於這些受負向回憶所困擾的族群，探索他們對特定記憶的遺忘機制有其臨床價值，Joormann 等人（2005）即表示，訓練憂鬱症病人主動遺忘（intentional forgetting）的能力，將是對抗自動化反芻思考（rumination）以及負向記憶偏誤的有效策略。

二、指示遺忘作業的特色與研究價值

指示遺忘作業可以用來探討記憶功能中遺忘的部分，此處所討論的遺忘特指「主動遺忘」，根據 Johnson (1994) 的定義，主動遺忘是個體有動機的嘗試限制特定記憶內容在未來的表達 (expression)，而自發性遺忘 (spontaneous forgetting) 的發生則無特定動機、不論訊息是否有效或相關，因而兩者有所區別。Roediger 與 Guynn 認為個體能抑制那些不再需要的記憶內容，他們能透過自己或實驗者的指示而對特定內容產生遺忘效果，而這些內容將不再干擾其他內容 (Roediger & Guynn, 1996)。指示遺忘作業通常以語義類字詞為實驗刺激，受試者於學習階段時被要求對每一個出現的刺激字加以記住 (to-be-remembered word, 簡稱 TBR 字) 或忘記 (to-be-forgotten word, 簡稱 TBF 字)，而在測驗階段時受試者被要求回憶或是再認所有在學習階段出現過的刺激字，無論該刺激字在學習階段出現時是被要求記住或忘記，透過比較 TBR 字與 TBF 字之回憶量，可以推論個體對特定素材主動遺忘或抑制提取之能力。

指示遺忘作業應用於臨床病理研究時，將刺激字再細分為不同類型 (威脅字、中性字、正向字)，透過實驗組不同類型字之間的作業結果比較，或與控制組之作業結果比較，得以瞭解我們所關心族群在該作業典範的表現模式，以此推估其認知功能之特性，顯然，其所指稱的記憶偏誤之邏輯與傳統記憶作業相似，都以特定某類型字的相對回憶量作為支持證據，然而就其記憶偏誤之定義而言，則較傳統作業寬廣許多。事實上，指示遺忘作業中 TBR 字的回憶與再認，就等同於傳統顯性記憶作業的測量，而增加了 TBF 字的部分，則使該典範不僅含括「記住」的觀點，亦可進一步討論「遺忘」的觀點，此一相對寬廣的記憶偏誤定義使得實驗結果得以類推至不同的臨床病理面相。Korfine 與 Hooley 以指示遺忘作業典範研究邊緣性人格疾患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他們以邊緣性人

格相關字作為威脅字（例如 abandon、alone），結果發現不論是社區的邊緣性人格疾患組，或正在醫院治療中的邊緣性人格疾患組，其對於 TBF 威脅字的回憶量皆顯著高於控制組，但在 TBR 威脅字的回憶量則沒有組別差異；作者認為一般個體在看到遺忘指示後，能運用認知機制來抑制進一步的精緻化處理，進而推論邊緣性人格患者之記憶偏誤可能是在面對顯著性（salient）刺激時，其抑制機制失效的結果（Korfine & Hooley, 2000）。另一個例子是 Moulds 與 Bryant 所做的研究，以急性壓力疾患（acute stress disorder, ASD）患者為樣本，創傷相關字為威脅字（例如 scream、terrifying），結果顯示在 TBR 威脅字的回憶量沒有組別差異，但急性壓力組在 TBF 威脅字的回憶量顯著少於控制組，此 TBF 字回憶量減少之現象被稱為高等遺忘效果（superior forgetting effect），作者推論這反映了急性壓力患者可能慣用認知策略來限制對於嫌惡刺激的編碼（Moulds & Bryant, 2002）。上述結果之研究價值是顯而易見的，換言之，在傳統記憶作業下無法呈現的記憶偏誤，指示遺忘作業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

第三節、指示遺忘作業的意義與測量

一、指示遺忘作業的認知機制議題

指示遺忘作業可分為兩種型式，項目法 (item method) 以及列表法 (list method)，兩者差異在於指示方式，項目法的實驗刺激以逐字呈現，並在每個刺激字後立即給予指示；列表法是將實驗刺激分為 TBR 列表與 TBF 列表，雖然也是逐字呈現，但會等到一整個列表呈現完之後，才給予指示要求受試者「忘記」剛才列表中的刺激字。這兩種型式的典型實驗結果皆為受試者對於 TBR 字的記憶表現優於 TBF 字，稱為指示遺忘效果 (directed forgetting effect)。

關於指示遺忘效果的認知機制，早期觀點認為指示的操弄影響了編碼歷程，亦即 TBF 字的處理受到指示的影響，沒有進一步的複頌，相反的，TBR 字受到精緻性處理而有較佳的編碼，因而產生指示遺忘效果 (Bjork, 1972)。以此編碼差異觀點預測，指示遺忘效果將同時出現在顯性與隱性記憶測驗，MacLeod (1989) 即發現，在項目法的指示遺忘作業中，受試者不但再認出較多的 TBR 字 (顯性記憶作業)，亦填充出較多的 TBR 字幹 (隱性記憶作業)。然而，若考慮該作業的另一種型式，即列表法的指示遺忘作業的實驗程序，呈現第一個列表後，「記住-記住」組被指示繼續記憶之前的刺激字，「忘記-記住」組則被指示忘記之前的刺激字，隨後繼續呈現第二個列表；由於「忘記-記住」組受試者是在整個列表呈現後才被指示「忘記」該列表之刺激字，我們可以合理假設，兩組受試者對第一個列表的刺激字之編碼並無差異，因而指示遺忘效果仍然存在暗示著可能有其他的認知機制促成了指示遺忘效果。

Bjork 等人認為另一種可能機制是對訊息提取歷程的抑制 (retrieval inhibition)，提取抑制表示對特定訊息之提取可觸性的遺失 (loss of accessibility)，事實上，該訊息仍儲存於記憶之中，並可透過自由回憶

以外的作業來證明，例如再認測驗、再學習 (relearning)、或間接測驗等。他們回顧當時的研究結果，提出證據如下：1. 有四個研究顯示以再認作業測量時，TBF 字的再認表現並不比 TBR 字來得差；2. 兩個研究顯示再學習典範中，TBF 字再學習的效果與 TBR 字一樣好；3. 在列表法的指示遺忘作業中，因指示忘記而對 TBF 字的影響效果，在某些情境下可以被消除而回復到原本的記憶強度 (Bjork et al., 1998)。

「編碼差異」與「提取抑制」兩種觀點各有其支持證據，然而若回到指示遺忘作業之操作程序上，則需考慮項目法與列表法兩種型式所顯示的指示遺忘效果可能是由不同機制所造成。Zellner 與 Bäuml (2006) 歸納：「目前一般共識為，項目法的指示遺忘作業反應了 TBR 項目與 TBF 項目的編碼差異，如同研究結果顯示項目法的指示遺忘效果可見於各種作業，例如自由回憶與再認作業。……而列表法的指示遺忘效果主要來自於對 TBF 項目在提取階段的抑制，其效果出現在自由回憶作業，而非再認或隱性記憶作業，此效果即使在偶發 (incidental) 學習作業中仍然存在。然而，不可否認的，這個共識仍各自有支持與反對之研究證據」。由此可見，在指示遺忘效果之認知機制上，仍存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

Taylor (2005) 提到，雖然目前多數學者接受選擇編碼是項目法指示遺忘效果的主要機制，然而，這僅僅解釋了選擇編碼後所產生的結果，而不清楚「選擇」是如何發生，也就是 TBF 項目是如何被排除於複誦歷程之外，Taylor 嘗試以注意力歷程來解釋這個現象，使用回向抑制 (inhibition of return, IOR) 典範，該典範常見的方式為，在視域的左邊或右邊給予提示線索 (preceding peripheral onset cue)，隨後目標出現於其中一側時，受試者儘快以按鈕反應該目標是在哪一側，而當目標與線索出現於同一側時，反應時間反而比目標與線索出現於不同側時來得長，此一與直覺相違背的現象稱之為回向抑制效果，其機制乃是由於注意力未能維持在線索出現的區域直到目標出現所致；應用於指示遺忘作業上，以刺激字出

現作為提示線索後，出現一個聲音（tone）指示受試者記住或遺忘，隨後目標將出現於左側或右側，受試者需儘快以按鈕判斷目標出現的位置。Taylor 預測，當給予「記住」指示時，受試者的注意力將持續停留在刺激字的位置，因而沒有有注意力飄移的現象，也就不會出現回向抑制效果，反之，當給予「忘記」指示時，受試者會將注意力從刺激字的位置移開，因而當目標出現在同一側時，反而需要更長的反應時間，結果支持假設。此一結果的重要性在於，項目法的指示遺忘作業中，TBF 字與 TBR 字的差異除了選擇性複誦外，TBF 的處理歷程中可能還包含有別於 TBR 的主動選擇歷程，例如避免讓注意力回到 TBF 字上，這個觀點挑戰了傳統認為 TBF 字遺忘歷程僅是被動地未經複誦。

另一個腦造影的研究也顯示，項目法指示遺忘中的主動遺忘歷程（TBF 字），在腦部區域的活動有別於主動記憶的歷程（TBR 字），若 TBF 字僅是複誦的歷程「不如」TBR 字，則不應出現不同區域的活動，更進一步，TBF 字的處理歷程涉及部分前額葉（medial frontal gyrus），顯示可能有控制或抑制的歷程參與其中，亦即支持 TBF 字的處理是一種主動性的認知歷程（Wylie, Foce, & Taylor, 2007）。若放在病理研究的脈絡下，優先考慮的則是所欲推論之現象，以本研究為例，若欲探討個體對特定訊息之主動遺忘能力，關鍵在於個體有動機的、依不同需求對訊息做不同認知處理，換言之，個體對於訊息處理之「主動性」應被強調。學者認為，在列表法指示遺忘作業中，受試者僅在列表中段受到一次「忘記」之指示，隨後又必須學習新刺激，這個實驗步驟使得受試者之遺忘歷程較為被動，而非主動（Joormann et al., 2005）。依上述觀點，使用項目法之指示遺忘作業，較符合本研究之目的。

二、指示遺忘作業與心理病理研究

在認知心理學的領域中，如本節前述內容之研究，皆預設所有受試者有共同的認知特性，故結果得以類推至人類之基本認知歷程。而在臨床的研究領域中，我們關切特定臨床族群的認知特性與一般人的差異何在，以及此差異與該臨床族群之情緒、思考、適應等各層面之關係為何。在以指示遺忘為作業的病理研究中，研究者關切病理組對於不同類型情緒刺激的作業表現結果與控制組之比較，換言之，有三種類型字（威脅字、中性字、正向字）分別接受兩種指示（記住、忘記），共六種情況（為了行文之便，以下將接受記住指示之威脅刺激簡稱為 TBR-T，以此類推，其餘情況分別簡稱為 TBR-N、TBR-P、TBF-T、TBF-N、TBF-P）。

由臨床現象或理論推演，研究者特別將焦點放在病理組在威脅字之作業表現，而在焦慮疾患的研究中，常見的假設為焦慮患者使用一種稱為逃避編碼（avoidant encoding）的認知策略，亦即逃避對威脅刺激作精緻化的處理。McNally 等人以曾在童年遭受性侵害，並被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疾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之成人為病理組，論述如下：曾遭長期性侵的兒童為了在高壓環境下生存，必須學會使用認知因應策略，如逃避編碼策略，使得他們得以轉移注意力，遠離威脅刺激，這些策略的使用可能演變為解離，且研究顯示創傷事件的解離現象可能增加後續個體被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疾患的機率，若以上論述成立，則同樣遭受性侵的兒童，使用逃避編碼策略者將比不使用者有較高可能性被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疾患，且此一認知特性應持續至長大成人後，而表現於作業結果中。他們進一步預測，創傷後壓力疾患組應逃避創傷相關字的認知處理，因而只對創傷相關字的回憶量較低，不論指示為記住或遺忘（即 TBR-T 與 TBF-T 之回憶量皆較低）；然而結果並不支持研究假設，意外的，創傷後壓力疾患組在 TBR-N 與 TBR-P 的回憶量顯著低於控制組，作者認為這可能是

創傷後壓力疾患的症狀導致整體認知資源不足的緣故 (McNally, Metzger, Lasko, Clancy, & Pitman, 1998)。

另一個例子來自 Cloitre 等人的研究，他們欲探討童年曾受虐的成人記憶功能特性，推論如下：個體若童年時期受虐卻又需仰賴照顧者生活，勢必發展出因應方式，他們可能選擇性遺忘受虐經驗，並熟練於此機制才得以存活，因而研究預期若指示這類受試者遺忘負向字詞時，他們的回憶量將低於一般組；不幸的是，由於每個類別字被回憶的數量過少，因而無法對類別變項做檢驗，然而另一項出乎預期的結果顯示，有童年受虐經驗之受試者在 TBF 字的回憶量與控制組無異，但在 TBR 字的回憶量卻顯著高於控制組，研究者推論這可能反映曾遭受虐者的因應方式並非遺忘創傷，而是去記住更多照顧者的愛與正向經驗，以維持與照顧者之間的關係，換言之，他們投注更多認知資源於記憶非創傷訊息上 (Cloitre, Cancienne, Brodsky, Dulit, & Perry, 1996)。

上述兩個研究顯示，心理病理組之認知特性可能出現在非威脅性刺激之處理上，此一結果雖然不符合傳統認知模式預期，卻也開啟了新的詮釋與討論空間，也再次顯示指示遺忘作業在心理病理之研究潛力，就筆者所知，在目前已發表之文獻中，仍未有學者以指示遺忘作業探討社交焦慮者之記憶特性，然而，在 Coles 與 Heimberg (2002) 的文章中，關於社交恐懼者記憶研究之文獻回顧內容，引用當時一篇審核中文章，由 Amir、Coles、Watlington 與 Foa 於 2000 年的研究，便以指示遺忘作業來探討社交焦慮者之記憶特性，根據文中引用的研究結果，廣泛性社交恐懼者在 TBR-T 之回憶量顯著高於控制組，若果真如其所言，該研究結果不啻為顯性記憶偏誤之直接證據，可惜至今未見其文章正式發表。

第四節、本研究關切之議題

一、憂鬱所扮演的角色

許多橫斷 (cross-sectional) 研究得到的結果發現，社交恐懼症與憂鬱疾患的共病率特別高，許多社交恐懼患者也同時符合重鬱病或低落性情感疾患的診斷準則，若回溯發病年齡資料，通常社交恐懼症在前，重鬱病或低落性情感疾患在後 (Wittchen & Fehm, 2001)。研究結果也一致顯示憂鬱患者表現出記憶偏誤 (Matt, Vazquez, & Campbell, 1992)。因而在社交焦慮者記憶偏誤的研究上，不論是否達到情感性疾患的診斷準則，我們都必須考慮憂鬱症狀對其認知功能的潛在影響。

除了高共病率外，社交焦慮者與憂鬱者在病理上亦有相似處：憂鬱症狀在主觀經驗上的表現，同時具有高負向情感 (negative affect, NA) 以及低正向情感 (positive affect, PA)，此一情感模式同樣見於社交焦慮者 (Kashdan, 2002)。早期 Clark 與 Watson 推論，姑且不論憂鬱與焦慮有類似症狀帶來的痛苦以及高共病率，低正向情感可能是專屬憂鬱所有的 (Clark & Watson, 1991)。然而，後續研究對於此觀點並不全然支持，目前資料顯示僅社交焦慮與憂鬱有類似的情感模式，亦即高負向情感與低正向情感，其他焦慮疾患則與正向情感沒有相關；而文獻後設分析 (meta-analysis) 顯示，社交焦慮程度與「正向情感」以及「好奇心 (curiosity)」有一致穩定之負相關 (好奇心被認為是正向經驗之重要來源)，因而在研究社交焦慮本質時，瞭解正向經驗之減少 (diminished) 是相當重要的 (Kashdan, 2002, 2007)。Wenzel 等人論述如下：憂鬱與社交焦慮個體同樣缺乏熱忱 (enthusiasm)、能量、以及正向參與 (positive engagement) 環境的能力，因此，邏輯上可以預測，社交恐懼者應像憂鬱者一樣，對於提取正向記憶有困難 (Wenzel et al., 2004)。換言之，這些相似特質對於社交焦慮者的研究結果形成混淆，使得我們難以確定究竟實驗效果有多

少部份是社交焦慮所能解釋的，例如 Becker 等人（1999）對於社交畏懼者記憶的研究，發現在排除（partialled out）焦慮指標後，憂鬱指標仍與記憶偏誤相關。此一影響在臨床樣本中可能更難以排除，相較於未達臨床診斷之高社交焦慮者，社交畏懼者症狀較嚴重，也有更多的情緒困擾與功能損害，可預期有更高比例的憂鬱症狀。Wenzel 與 Holt（2002）以門診社交畏懼症病人為樣本，在排除所有第一軸其他診斷與相關病史後，其臨床樣本之貝克憂鬱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得分仍舊顯著高於控制組。顯示在社交焦慮的研究中，憂鬱症狀是需要控制或是排除之變項，本研究將對作業資料進行共變數分析，將憂鬱程度作為共變數，以確保可能的顯著效果來自於社交焦慮特質，而非憂鬱症狀的影響。

二、高社交焦慮者記憶研究所使用的刺激材料

為了觀察選擇性記憶偏誤，選擇與其疾患或恐懼基模相關之刺激材料是相當重要的（Becker et al., 1999）。因而在以社交焦慮者為對象的記憶研究中，根據該疾患之特性，多選用在社交情境中批評、困窘或拒絕的字眼作為威脅字，然而，研究者對於正向字的選用則無特別強調。以 Lundh 與 Öst 的研究為例，其所選用的威脅字為社交威脅字，例如 critic、shy、embarrassing、unwelcome 等，而其所選用的正向字則多為一般正向感受之字眼，例如 tasteful、hopeful、nourishing 等（Lundh & Öst, 1997, Appendix A）。此一刺激材料選用固然與社交焦慮者害怕負向評價之核心特性相關，然而近來的研究指出，社交焦慮者害怕評價的特性可能更為廣泛，即他們同樣害怕正向評價；學者更進一步發展了正向評價恐懼量表（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Scale, FPES；Weeks, Heimberg, & Rodebaugh, 2007），以測量個體在面對正向回饋時主觀感受到的不適感（discomfort），並驗證此量表得分與社交焦慮指標成正相關，且與其他

建構有良好的區辨效度 (Weeks, Heimberg, Rodebaugh, & Norton, 2007)。

因此，若我們接受害怕正向評價同樣也為社交焦慮之重要特徵，似乎可以假設，社交焦慮者在對正向訊息的認知處理上，可能與一般人有所不同，這亦是本研究所關切的議題之一（詳見下節之研究假設）。故本研究主張，社交焦慮者記憶研究中刺激字的選用，除了威脅字應用社交威脅字外，正向字也應在社交情境的脈絡下選取，根據 Weeks 等人的研究結果，可考慮選擇在社交情境中可能出現之正向評價字眼，關於本研究實際材料之選用，請參見研究方法中實驗刺激材料之討論。

三、認知偏誤的另一種觀點

社交焦慮者的病理研究上，許多學者致力於發現認知功能上的負向偏誤，亦即他們比起一般人有更多的負面認知特性，因而產生了病理及臨床上的症狀；另一種思維可追溯到社會心理學家對心理健康的觀點，由 Taylor 與 Brown 所提出，他們認為一般人的思考，或心理健康的本質，築基於一種正向的錯覺 (illusion) 之上，亦即對自我過度正向的評價、高估控制或掌握外在世界能力，以及對未來不切實際 (unrealistic) 的樂觀等；正向錯覺能夠過濾外在環境的訊息，特別是當個體面對負向回饋時，此機制具有保護的作用 (Taylor & Brown, 1988)。此一觀點在當時備受爭議，也未被後來學者全然接受，然而，其開啟了心理健康的另一種思維，亦即缺少一般人所擁有的心理機制，例如「缺乏正向特質」，也是心理病理的一種可能型式。

Huppert 等人的研究中，將對社交事件的解釋偏誤區分為負向以及正向，結果發現兩者僅有些許 (modest) 相關，顯示負向解釋偏誤與正向解釋偏誤並非同一向度的兩個端點 (Huppert, Foa, Furr, Filip, & Mathews, 2003)。Hirsch 與 Mathews 延用此觀點，他們認為社交畏懼者缺乏了一般

人的正向推論偏誤 (positive inferential bias)，研究結果顯示面對模糊訊息時，一般人傾向做「即時 (on-line)」且「正向」的推論，而社交焦慮者則沒有這種傾向，作者認為這種機制相當於一種訊息過濾器，特別是面對外在環境的負向回饋時，能夠對自尊起著保護作用，而社交焦慮者乃是因為缺乏該機制而時常感到自尊受威脅 (Hirsch & Mathews, 2000)。Kashdon 的觀點則認為低正向情感以及正向經驗之消弱，可能是社交焦慮者的重要特質，這個分析結果在控制憂鬱變項後仍然顯著 (Kashdon, 2007)，以此觀點，社交焦慮者是因為缺乏了正向偏誤或正向之情感、經驗，因而當面對正向評價時，未能像一般人得到自尊的提升或者保護作用。綜合上述，目前對其心理病理之兩大思維取向，分別為「過多負向特質」以及「缺乏正向特質」。理論上，兩種狀況都有可能造成適應上的困難；實徵研究上，亦各有支持證據，因此，在從事社交焦慮者之病理研究時，兩種觀點皆應納入考量。

第五節、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

一、研究問題

由前述的文獻回顧可知，目前對於社交焦慮者之記憶偏誤研究仍未有一致的結果，特別在以語義類刺激為主的研究中，缺乏顯性記憶偏誤之直接證據，而在隱性記憶偏誤的研究中，隨著作業之改良，逐漸出現較為一致的結果，但仍需更多後續研究結果加入討論，然而，過去研究主要限制為對記憶偏誤之定義較為狹窄，主要侷限於「對負向刺激材料的記憶或辨識之數量較多」，且都由「記住」的觀點出發，而忽略了記憶功能多面相的本質。本研究擬以實驗法探討社交焦慮者另一個記憶功能面相，採用指示遺忘作業，探討高社交焦慮者是否具有記憶偏誤，藉由社交焦慮者對於各類型之刺激字，在「記住」與「忘記」指示下之回憶情形，推論其與心理病理之關係。

在探討社交焦慮者記憶偏誤議題上，不能忽略的是大量文獻證據並不支持顯性記憶偏誤之命題，身為研究者，我們預設此一命題為真，衍生相關假設，再由假設檢驗回頭討論此一命題之真偽，然而另一方面必需思考的是，若社交焦慮者之記憶偏誤的確存在，何以過去研究無法提供支持證據？除了 Amir 等人（2003）提到因為研究記憶歷程不同或使用不同記憶作業外，另一個可能原因是，記憶偏誤的效果量太小，因而統計分析的敏感度並不足以偵測，部分研究顯示社交焦慮者的記憶偏誤出現在組內回憶模式的不同，而非組間差異（Wenzel et al., 2004），McNally 等人的研究中也提到：研究證據出現在後續的比較分析，而非變異數分析之中，也許反映出多用途（omnibus）的變異數分析對於偵測重要效果是相對不敏感的，特別是在樣本人數較少的情況下（McNally et al., 1998）。因此，雖然研究假設主要預測組間差異的結果，然而對於研究資料的分析必須同時考慮組間以及組內兩種可能性（詳見下章研究方法之資料處理）。

二、研究假設

在指示遺忘作業之典型實驗結果為受試者對於 TBR 字的記憶表現優於 TBF 字，稱為指示遺忘效果，該效果顯示了個體能依據實驗指示，對刺激材料做不同認知處理的程度，由於沒有證據支持社交焦慮者對於訊息有全面性的處理偏誤（如前所述，創傷後壓力疾患組即顯示在 TBR-N 與 TBR-P 的回憶量顯著低於控制組，可能是由於認知資源不足產生整體性的訊息處理偏誤），因此本研究預期**高社交焦慮組應與低社交焦慮組同樣出現指示遺忘效果（假設 1）**，亦即高社交焦慮者仍具有依據指示對刺激材料做不同認知處理的一般能力。

由前面文獻探討可知，指示遺忘作業中 TBR 項目之回憶作業，性質類似於傳統顯性回憶作業，而目前大量研究結果顯示，社交焦慮者在以語義刺激之顯性回憶作業上，都未有支持記憶偏誤的證據，這些結果似乎符合 Williams 等人以及 Amir 等人的「抑制」觀點，即社交焦慮者透過控制化歷程，抑制了隱性記憶偏誤的提取，因而使得顯性記憶作業的表現無異於一般人；以此延伸，指示遺忘作業中的 TBF 項目，受試者要遵從「忘記」之指示，個體必須對 TBF 項目之編碼複誦或提取過程有意識的抑制，根據「抑制」觀點預測，高社交焦慮者應熟練於此機制，當給予「忘記」指示時，高社交焦慮者將比一般人更能抑制威脅刺激，因而在指示遺忘的威脅刺激回憶量，將低於控制組，依上述討論，本研究假設，**高社交焦慮組在 TBR-T 項目之回憶量無異於控制組（假設 2）、高社交焦慮組在 TBF-T 項目之回憶量顯著低於控制組（假設 3）**。

根據文獻研究結果，未有證據顯示高社交焦慮者對正向刺激有記憶偏誤，然而，D' Argembeau 等人以臉孔為刺激材料，在學習階段先呈現情緒臉孔（快樂、生氣），於作業階段再呈現同樣臉孔之中性表情，要求受試者評估是否在學習階段看過該臉孔，以及當時該臉孔呈現的表情為何，結

果顯示一般人對於先前呈現快樂表情之臉孔的辨識程度較高，且有較佳的表情記憶（相對於生氣臉孔）；高社交焦慮者則對於快樂臉孔與生氣臉孔之辨識以及表情記憶沒有差異，且高社交焦慮組對於快樂臉孔之辨識及表情記憶皆顯著低於控制組，換言之，高社交焦慮組缺乏這種對於正向表情之記憶偏好，使得正向表情臉孔的回憶量少於一般人（D' Argembeau, Van der Linden, Etienne, & Comblain, 2003）。無獨有偶，在 Amir 等人的隱性記憶研究中，發現控制組明顯偏好正向影像甚於負向影像，而高社交焦慮組則無此偏好（Amir et al., 2003）。以此結果預期，控制組在正向刺激的回憶量應高於負向刺激，而高社交焦慮組則無此情形，考慮這些文獻結果，本研究假設低社交焦慮組在 TBR-P 項目之回憶量顯著高於 TBR-N 項目與 TBR-T 項目（假設 4），而高社交焦慮組在 TBR-P 項目之回憶量顯著低於控制組（假設 5）。

由於未有文獻討論社交焦慮者對正向刺激的記憶偏誤，本研究同樣依據「抑制」觀點預測其在作業之表現，文獻顯示社交焦慮者在正向情感與正向經驗少於一般人（Kashdan, 2002, 2007），以記憶的觀點，我們可以合理假設正向情感與正向經驗應與記憶中正向素材的保留量有關，從「抑制」觀點出發，高社交焦慮者慣於使用抑制機制，當指示其「忘記」正向刺激時，將使其在指示遺忘的正向刺激回憶量低於控制組，依此本研究假設，高社交焦慮組在 TBF-P 項目之回憶量顯著低於控制組（假設 6）。

三、小結

綜合上述，本研究的主要假設如下：

指示遺忘效果

假設 1. 高社交焦慮組應與低社交焦慮組同樣出現指示遺忘效果。

高社交焦慮組在指示記住之威脅刺激回憶情況

假設 2. 高社交焦慮組在 TBR-T 項目之回憶量無異於低社交焦慮組。

高社交焦慮組在指示忘記之威脅刺激回憶情況

假設 3. 高社交焦慮組在 TBF-T 項目之回憶量顯著低於低社交焦慮組。

高社交焦慮組在指示記住之正向刺激回憶情況

假設 4. 低社交焦慮組在 TBR-P 項目之回憶量顯著高於 TBR-N 項目及 TBR-T 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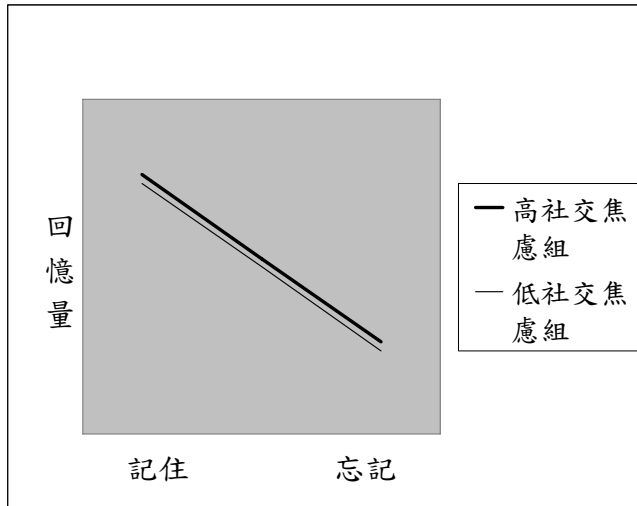
假設 5. 高社交焦慮組在 TBR-P 項目之回憶量顯著低於低社交焦慮組。

高社交焦慮組在指示忘記之正向刺激回憶情況

假設 6. 高社交焦慮組在 TBF-P 項目之回憶量顯著低於低社交焦慮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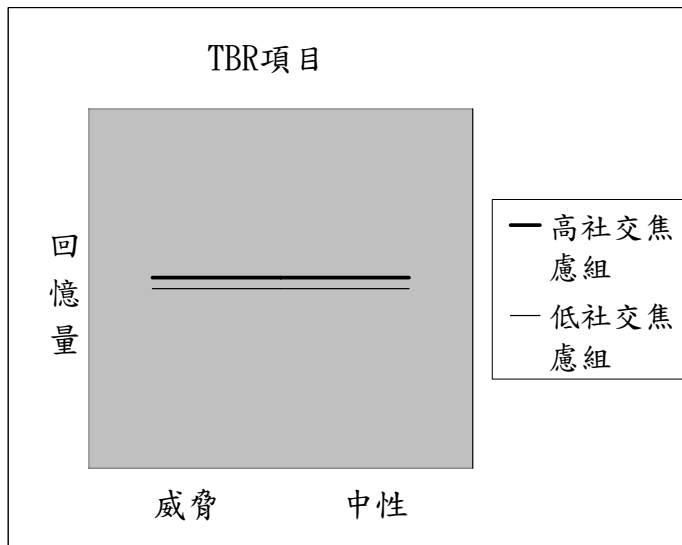
本研究共有組別（高社交焦慮組、低社交焦慮組）、指示語（記住、忘記）以及刺激詞類型（威脅、中性、正向）三個主要獨變項，依變項則為各類刺激詞在不同指示下之回憶量，即三種類型詞分別接受兩種指示，共六種情況（簡稱 TBR-T、TBR-N、TBR-P、TBF-T、TBF-N、TBF-P）之回憶量，而刺激詞的三種類型中，中性通常做為組內比較之基準值，因而本研究特別關切威脅以及正向兩種類型刺激詞在不同指示下之回憶量，茲將本研究之假設以實驗語言重新整理如下：

假設 1. 兩組皆出現指示遺忘效果，即指示語變項具有主要效果，不論高社交焦慮組或低社交焦慮組，TBR 項目之回憶量應大於 TBF 項目之回憶量，見下頁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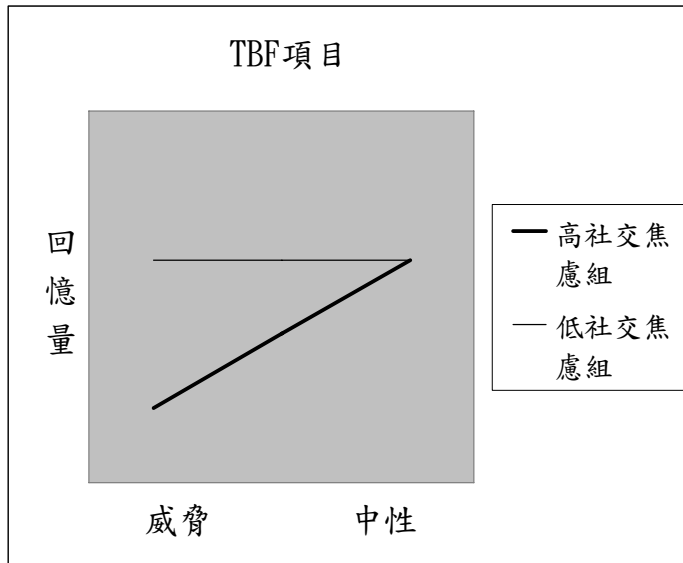
圖一 指示語變項之主要效果示意圖

假設 2. 高社交焦慮組在 TBR-T 項目之回憶量無異於低社交焦慮組，在指示語為記住的情況下，組別變項與刺激字類型沒有交互作用，見下圖二。



圖二 指示語為記住的情況下，組別變項與刺激字類型變項無交互作用之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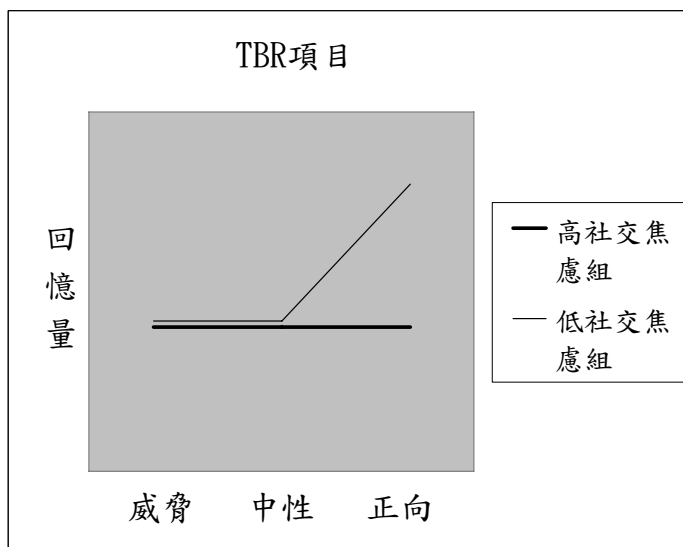
假設 3. 高社交焦慮組在 TBF-T 項目之回憶量顯著低於低社交焦慮組，在指示語為忘記的情況下，組別變項與刺激字類型有交互作用，見下頁圖三。



圖三 指示語為忘記的情況下，組別變項與刺激字類型變項交互作用之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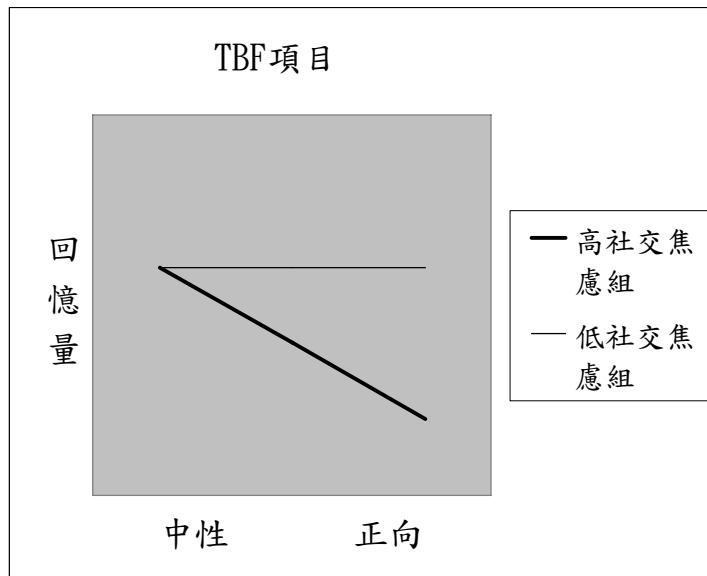
假設 4. 低社交焦慮組在 TBR-P 項目之回憶量顯著高於 TBR-N 項目及 TBR-T 項目之回憶量

假設 5. 高社交焦慮組在 TBR-P 項目之回憶量顯著低於低社交焦慮組，在指示語為記住的情況，組別變項與刺激字類型有交互作用，見下圖四。



圖四 指示語為記住的情況下，組別變項與刺激字類型變項之交互作用示意圖。

假設 6. 高社交焦慮組在 TBF-P 項目之回憶量顯著低於低社交焦慮組，在指示語為忘記的情況下，組別變項與刺激字類型有交互作用，見圖五。



圖五 指示語為忘記的情況下，組別變項與刺激字類型變項交互作用之示意圖。